

文化自觉的主体性维度

——对文化自觉“时间轴”的哲学反思*

蔡后奇 洪晓楠

[摘要] 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时间轴”虽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展开的，但也对哲学开放。从唯物史观来看，文化自觉的历史源起、现世图景和“应是”景观都需做进一步思考。文化自觉起源于实践，实践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动力，在实践基础之上，先后形成了主体性的充分觉醒、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文化启蒙得以完成，以及文化自觉对于主体的反作用力。这四部分综合在一起，表现出作为整体的文化自觉在历史发展中的动态图景。文化自觉的现世图景主要表现为资本逻辑对于大众的文化自觉的压抑，但这不是历史的恒定态。文化自觉的未来景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文化自觉的创造性、超越性和价值引导性作用于实践主体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文化自觉 主体性 资本逻辑 文化强国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4) 03-0018-08

文化自觉的提法，最早由许苏民先生在1986年提出。1997年，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自觉定义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在生活各方面起的作用，也就是它们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其发展的方向。”^①后来，汤一介先生又确认了文化自觉的主体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论虽然主要是在社会性和人类学的领域中展开的论述，“然而‘文化自觉’的理念及费老的论述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社会学、人类学范围。”^②我们主要从哲学的视角来反思文化自觉论。许苏民先生、费孝通先生、汤一介先生告诉我们文化自觉是什么，但是没有从主体性的视角，告诉我们文化自觉从哪里来，文化自觉的现状如何，文化自觉要通过什么途径到哪里去。费孝通先生曾用数学修辞的方式，给文化自觉画过一个坐标轴，其中的纵轴是从传统和现在创造性的结合中去创造未来，这是文化自觉的时间轴。遗憾的是费老并没有太多的论述，没有阐明出文化自觉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发生机制和动态发展图景，也没有明确指出历史怎样和现在创造性结合。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历史必然趋势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些反思是必要的，能充实和完善作为文化强国建设重要精神动力的文化自觉。大致说来，文化自觉终极源动力是人类实践活动，但是这不是最为直接的起源，而是在物质实践活动达到一种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实践之后，才形成文化自觉，其中主体性的觉醒起到极为关键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13AZD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蔡后奇，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洪晓楠，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连，116023）。

的作用。哲学主体性是文化自觉的理论起点，历史实践活动是文化自觉的现实起点。但是主体性主要向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敞开，其中文化自觉发展了主体性的文化维度。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不容乐观，主要是因为历史主体受到资本逻辑形而下的单向度魅惑和在文化霸权重压之下的沉沦。但这不是一种历史的恒定状态，文化自觉作为一种双向度的历史发展动力，其内在意蕴能打破现代世界的拜物魅惑。文化自觉向未来社会开放，只有将文化自觉发展成为具有未来视野的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充分发挥文化主体的创造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不断积极实践和努力探索，才能完成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

一、文化自觉的历史源起：从主体性实践到大众的文化自觉

主体性 (subjectivity) 是一个哲学概念。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将人的主体性规定为人的自我意识运动，为人的自我意识运动开辟了一个先验主观主义的新场域，后经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唯心思辨，主体性在黑格尔哲学那里成为精神主体论。德国古典哲学家虽然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但究其根本，他们也只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高扬了心造幻影式的唯心主体性。与先验精神主体论相对应的是狄德罗、拉美特利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所主张的物质主体论，但人的主体能动性，完全被他们湮没在物质世界冰冷的逻辑必然性所藏身的客观规律之中，人只能服从客观规律去认识世界，但不能利用客观规律改造世界。这正如马克思所言：“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认为的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的过程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等属性，是对主体的内部张力的复写、摄影、反映客观实在性的共同规定。自由是主体性的终极追求，并且自由和主体性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认为，人“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4] 自由是主体性的归宿，也是主体性的动力。在主体性追求自由的过程之中，正是人类受到自由理念的驱使，发现在生存现状压迫之下，作为自身内在结构的灵肉失衡，人为了改变这种失衡状态而付诸实践，这种实践动能不断冲破现世之岸的时间长河。人在面向未来的历史空间追求更加完善的主体性，也是基于对现实不满所迸发出的历史正能量。当然，这只是对历史发展的轨迹所作的最粗线条的描述，任何一种历史形态的进步都不是单一作用力的结果，而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合力论”，^[5] 自由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源动力，也作用于其他的社会发展动力。大致说来，主体性对于历史演变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追求更加自由的生产力的经济关系变革、在经济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所追求的具有更多自由属性的制度变革，以及“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 的文化方面的变革。相对于历史发展的政治变革动力和经济变革动力，文化的变革动力要隐晦得多，几乎是处在被遮蔽的状态之中。究其原因，文化在历史发展处表现出来的动力，一方面很容易被作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导致的宏观变革所遮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化在历史发展处转化为动力的复杂机制所致。马克思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 所以，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的研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重要维度。大致说来，抽象的文化转化为促进历史发展的动力，必须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这中间的转化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第一，主体性的充分觉醒。主体性深深植根于人的实践基础之上，主体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开展而渐渐觉醒。主体的觉醒，起步于人类劳动实践活动的物质生产层面，而后是精神生活层面的觉醒。随着人类精神生活辐射圈的不断扩大，人对于哲学的自觉意识也会渐渐萌发。只有在当一个民族的哲学诞生之后，才确立这个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哲学表征为一个民族成熟的在世方式，只有当主体成熟为哲学自觉的高度，才能对所有的人化现象进行立体的批判、反思和建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从哲学的层面确立主体性，才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和拨开时间的迷雾，澄明民族前进的方向。经过哲学思辨的主体才是一种成熟的主体，在此主体上构建起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沉淀为一种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的深沉的文化自觉意识。也正是在哲学主体性的确认之中，人类能体察到自我在浩瀚时空大全的在世性，能自知到苏格拉底式的“无知”，能省察到黑格尔式的“熟知”非“真知”，

能思辨到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朦胧语境背后的宏大宇宙规律、历史节奏和生命韵律。主体的创造性冲动是人冲破此岸世界向彼岸世界涌动的本质性力量，人在追求终极关怀的途中，也正是人从被抛性走向创造性、从常识世界迈向真理世界，从自在自为状态质变向自省自觉状态的总体性道路。所以，哲学主体性对于文化自觉有着逻辑在先性，文化自觉植根于哲学层面的主体性之中。但是，主体性基础的文化自觉，仅是文化成为历史发展动力的第一块砖，并且是一块经过形而上学抽象之后看不见的砖，所以，文化自觉的实践主体必须得到确认。

第二，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作为历史文化现象背后的精神力量，也是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纵横交错、地理民风圈性限制、政治经济隐形操控的文化合力。针对历史同一时期的文化自觉程度而言，不可能是群体的齐一式苏醒，所以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文化自觉意识需要那些具有先知先觉的时代领潮人士唤醒。相对于历史演变规律而言，物质生产形态的新旧换态的前在性条件，是人的精神形态的新陈代谢，文化精英是历史规律和作为历史的人的文化自觉合力的结果。文化精英有足够开阔的历史视野，能觉察到那种落后的具有坏的循环特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惰性周期，在落后的社会形态之下保持独立人格，冷眼蔑视落后文化所熏陶出来的只知低头于当下膜拜权贵的趋炎附势者，作为时代的良心，能先于时代勾勒出社会形态“应是”的崭新历史图景，提前预设一种趋真善的价值观、趋平等的权利观、趋公平的正义观。他们能够提供一种“批判的武器”，虽然这种武器只是一种寓身于文本之中的批判，但毕竟是“武器的批判”的前提。“历史观念的每一次变革，都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历史图景。”^[9]文化精英是历史发展的指南针、是富有创造性革命精神的时代急先锋、是先进文化自觉的实践主体。但是，如果不把文化精英这种小众的文化自觉转化为大众的文化自觉，那它顶多算是一种悬空的批判。

第三，文化启蒙得以完成。文化启蒙的成功，是作为总体的劳动人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大爆发，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形态深入人心之后激发出来的人类改造现实的冲动。相对于普通大众的“后知后觉”或者“不知不觉”的状态之中而言，文化精英的先知式的文化自觉必须通过大众化的途径来实现对大众的启蒙。“这些创新一旦为群体所接受，就进入人文世界的内涵，不再属于任何的个体了”。^[9]精英文化大众化的途径有多种：先进文化理论的实践化、语言修辞的日常化、素质教育的普及化以及行为中介的合理化。文化启蒙成功之后，一种先进的文化观念通过大众化深入人心，民众的文化自觉也随之觉醒，这也就代表了历史的不可逆性，这种大众化的文化自觉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会以燎原之火的态势，向传统社会的旧思想迅速辐射开来，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对落后思想文化的支柱进行瓦解。鲁迅、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的大旗一直插在封建愚昧的坟墓之上；邓小平开改革开放之先河，代表价值规律支配资源的市场经济文化取代权力支配资源的国家计划经济文化，已经是众人皆知的道理。这些文化启蒙的案例，虽有启蒙的范围和层次之别，但其中的规律大致相同。文化启蒙的完成只是在历史形态或者某一社会形态的转折处才出场的，文化自觉如何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恒动力而在世？这就需要文化自觉对于社会现实保持着永不消逝的自主力、批判力、实践力、创造力，这主要体现为文化自觉对于主体的反作用力。

第四，文化自觉对于主体的反作用力。经过文化精英对于大众的启蒙，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由理想变为现实。但是，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对主体有舒缓的麻醉作用，主要体现为在安于现状中，主体批判性的逐渐消失、追求“至善”的激情逐渐消退。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是构建未来社会形态的硬件和起点，只是在宏观方面推动历史发展，但是在微观的层次之中，仍需要实践主体的批判能力。“文化进步源于对现状（即人的生命存在的现实状况）的批判性思考，即一种优化人自身的意向的产生。”^[10]这种批判能力，是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在由“善”通往“至善”的途中，文化自觉应一直是主体的“清醒剂”。文化自觉要一直反作用于主体，要求主体对崭新的社会形态的塑形力不能消失，认识到社会改革的间歇性完成不意味着历史文化使命的完成，从而保证现实社会在历史坐标不迷糊、现实批判力不

消失、勾勒未来社会文化形态的激情不消退。针对中华文化而言，正是这种民族主体的深沉文化自觉意识才保证了中华文化的主体脉络没有中断。

文化自觉形成以后，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恒定态，其宏观脉络表现为一条上下起伏的波浪线。这是由文化自觉的载体所决定的，大致可分为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和作为启蒙对象的大众的文化自觉。在历史转型或者在文化大繁荣的历史时期，文化自觉处于高峰期；在历史的其他时期，除了文化精英保存文化自觉的种子之外，普通大众的文化自觉往往是处于潜伏期。市场经济在我国落地生根之后，资本逻辑对于文化自觉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为，对大众文化自觉的压抑。作为一个有忧患意识的民族，对当下的文化自觉现状有必要进行哲学层面的反省。作为时代文化精英的共产党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先后提出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以改变当下文化自觉受压抑的处境。

二、文化自觉的现世图景：资本逻辑压抑之下的大众文化自觉“呼吸之难”

资本逻辑压制住了大众的文化自觉。其实，资本是一个哲学辩证性和历史可塑性很强的中性概念。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资本一度被历史塑形为具有善良意志的发展驱动力，邓小平的“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就是在语境中绽放的理论之花。但是如果少了制约资本运行的人文环境，人不去追寻精神世界，而被价值规律那只隐形的手牢牢攥住，资本就很容易“裸奔”成一种引发人的原始欲望的魔鬼。其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道德伦理的侵蚀、对人文理念的单向度误导，以及对文化自觉的压抑，都成了时代质问资本的话题。没有制约机制的资本，既破坏了自然生态也破坏了文化生态。这种“裸奔”的资本，是资本逻辑的充分外化。资本逻辑通过把人的视野引向非生命本真的虚假消费，以此抽空人的文化生命；而文化自觉是有历史、有现在、有未来的自身关切。文化自觉和资本逻辑像太极阴阳鱼一样交织成“欲望—生命”的辩证境域。但是在当下，资本逻辑是处在优势地位，除了中国文化精英对资本逻辑保持应有的批判和反思之外，资本对于大众是处于一种肆虐状态的。简要说来，资本对于大众的文化自觉的压抑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资本拜物教压抑了大众文化自觉之“吸”。根据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的“时间轴”提出的观点，文化自觉应在现实和历史结合的创造性视野中关切未来，但是结合文化状态来看，文化自觉被资本逻辑遏制住了回归文化历史和感知文化现实的维度而无从“吸气”。资本拜物教把人的视野聚焦在当下，通过制造不断边缘化的奢侈符号实现了人的自我主动囚禁，作为文化自觉维度之一的当下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被切断了。所以，拜物教统治的年代，可以被称为对历史文化自觉的遮蔽时代。尽管有些民族文化精英也对大众进行历史引导，试图唤醒国人的文化自觉，但是他们对历史的唯趣味化解读和对历史经典文本的心灵鸡汤式阐释，是鲜有历史厚重感的速食文化，这些文化碎片经不起资本逻辑之于人的迅猛冲击，人的历史总体意识仍是处在被遗忘的境地。人被拜物教囚禁于当下。同时，拜物教还遏制了作为现实的文化交往，让国民的现实文化意识成为了抽象。资本拜物教的驱动机制是资本外化为某一阶段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将科技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法，通过日常生活的微观影响，逐渐渗透到人类的精神文化层面，完成对人的科技化塑形。自此，国人诗性智慧构建的精神家园，被偷换成测量工作效率和效益的有专门化标准的量化机制，这种“量化”对于人的微观心理的影响，放在生活世界的图景中就表现为资本的拜物教，是对物的标价的追逐。身为拜物教徒的大众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真我”主导的本我需求之联系，而是将他人异化成可以盖棺定论的默默无声的客体，都是供“我”操作的工具，人人与人之间只剩下物的连接。由此资本拜物教所规训出来的人，只是追求物质的欲望机器，人在主动追求无限升级的新产品和层出不穷的商业符号时，物实现了对人的单向度魅惑，人在资本逻辑统摄的粗糙的实用主义世界中沉沦下去。在资本逻辑盘踞大脑之后，人与人之间关系被填充上效益原则、竞争原则、权力原则和现实原则，人们之间的传统美德、本我交往、善良本性、道德约束被打破，人被作为“物”的自我所囚禁，切断文化交往。拜物教切断了文化自觉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只剩下作为物的空壳的大众，也就表现为公平的倾斜、道德的黄昏、善良的迟暮、正义的遁形。

第二，资本文化霸权压抑了大众文化自觉之“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漫长的资本积累、增殖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资本逻辑像是“抽象的蛇”一样善于发现空白。他们根据资本规律和人之所需，创造性地把资本和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并随着强势资本的外输达到了文化输出的意图，以完成一种后殖民特征的文化霸权占据。约瑟夫·奈更是将“软实力”（soft power）作为考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西方文化霸权主要是通过文化产品的资本化、现代科技的快捷化、产品物种的多元化实现了其在世界范围内文化资本的盈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我们仍是处于文化资本前批判时期。我们的批判是怀着“华夏文化疆域”的民族情感进行文本对文本的批判，尚未处于西方学者基于资本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主体文化自觉的高度，一方面，由于我国文化生产力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作为文化资本实践的文化产业也还刚刚起步；另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以大众商品为输出物，搅乱了我们从当下文化现状突围出去的文化自觉意识，我们的文化想象力、文化创造力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在此全球文化霸权的境域之下，国人以包裹着资本逻辑的西方大众文化为营养，主体的文化自觉悄然滑向了对资本符号认同的形而下沉沦，此时的文化自觉尚不能给物欲社会提供一份自由呼吸的氧气。但这些正是我们文化自觉的前自觉，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正是我们意识到此时正处于文化涅槃的境域之内，这是文化新生的前在条件。所以西方的文化霸权绝不是历史的恒定态，文化资本是西方资本逻辑的黄昏景观，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必然在西方大众文化的烈火中获得新生，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是必然，大众文化自觉的自由呼吸也是必然。

然而，对文化未来图景的展望也不能遮蔽当代中国被资本逻辑压抑的现实症状。针对这种切断了民众的历史意识、异化了市民社会的资本逻辑为何能在当代中国肆虐横行，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追问其如何形成的，即追问资本逻辑造成了大众文化自觉“呼吸之难”的原因。大致说来，主要有哲学层面、认知层面和运作层面的不足。

首先，哲学层面是对资本逻辑的误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1]的哲学误读。“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辩证法被置换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2]恩格斯将辩证法的载体误认为是只有物质属性的人化自然，而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点影响了我们对于资本逻辑本性的判断。资本世界虽然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图景，但是从黑格尔的视角看来，资本正是“绝对精神”在现实世界中“外化”的体现，它将人化世界中万事万物的演进规律，辩证成资本为了实现其内在精神的螺旋上升图景，在追求资本全球化这个大写的“一”的过程之中，先后扬弃了田园牧歌的农业生产、机器轰鸣的大工业生产，千手智能的自动生产线，在一种虚拟资本中回归到抽象的“绝对精神”，构建起“虚拟货币—科学技术—文化资本”三位一体的世界精神，也建构起拜物教徒追逐膜拜资本、物与物的关系吞噬人与人的关系的“新神学大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虽然对黑格尔的神学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但是他只是归结到没有人的精神文化维度的“自然”。放在资本的领域里，我们按照恩格斯的思路，也只是将“神学资本”置换为“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辩证运动仍然是冷漠无声的物，马克思所关涉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里是不见踪影的。并且，恩格斯在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也有一个误判，即恩格斯是按照“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观念来阐释马克思，从而把马克思关于‘以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为基础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新观念完全遮蔽起来了。”^[3]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能动的存在和能动的思维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资本和人的异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此同一性作用的统摄之下，人就陷入了资本逻辑从运动开始就设好的圈套，丧失了人的精神文化维度。恩格斯用黑格尔遮蔽了马克思，也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大多在恩格斯的自然物质世界里理解马克思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似乎没有出现在恩格斯的视野之内，对资本的文化自觉完全被物的属性掩盖了。在市场资本初入我国表现为善的特征之后，现在资本对人的单向度塑形也开始彰显。所以在回答完“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

义”之后，也要开始回答“文化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首要任务是“回到马克思”，唤醒符合时代需要的大众的文化自觉，并以此作为精神动因，在具体实践中将资本关进文化的牢笼中去，创造出适合文化和资本共生态的文化氛围。

其次，认知层面是人文和技术的断裂，即没有认识到理想的生产力模式应是“技术—科学—文化”三位一体的生产力。在现实生活中，就导致了重视实用的技术，而轻视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技术是资本逻辑的外化，在一个追逐物的世界里，技术很容易成为资本的工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曾一度被认为只是在物质世界里的第一生产力，这主要是对科技的“技术”层面的指认，而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中的“科学”层面也是一种“精神生产力”，并且“精神生产力”对于科技的发展能起到积极的反作用。所以，科技一直被普通大众在概念误认的前提下，在被用作造物的世界里，改变了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认知。在教育领域里，重理工而轻人文；在生产的领域里，人们更加看重能够直接带来财富的技术人才；在生活领域里，人们对技术之实用的认知也高于对人文的认同。技术和工具理性融为一体，在日常生活世界中通过微观的心理控制阻断了人们对于文化和技术之间的关联，人们有“技术自觉”而没有“文化自觉”。其实，在物质世界里，技术万能论可以成立。但是人之为人，就在于有精神文化生活的存在。所以，在人类社会的图景中，技术和文化的断层是应该的，在二者之间还有科学作为中介，“技术—科学—文化”辩证成为一种先进的文化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现实驱动力之一。

最后，运作层面是对资本运行环境的缺少人文情怀的制约。资本不姓资也不姓社，但是要区分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的最后归宿是财富，而社会主义国家资本逻辑的起点和落脚点都是人。但是相关的理论建设还没有形成体系，所以在此之前，我们都是简单照搬西方资本运行的方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西方资本运行初期的恶劣环境，都是直奔财富而去，缺失了人文情怀制约的裸奔资本，但追求资本如饮海水，越饮越渴。所以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下运行，就表现出资本鸦片的属性，资本秩序遮蔽了生命价值秩序。这些也正是西方学者批判的重点，我们原版照抄，结果就是和他们“学坏”，资本运行的环境少了人文情怀的约束，同时也压抑了让人文精神涌现的文化自觉。我们在引进西方资本运行的环境之中，为了防止跟着他们“坏后才好”，被压抑的文化自觉急需苏醒，批判地学习、创造地改造，以完成资本向人而不向物的转向。所以要将资本放进文化的牢笼里，来建构起适合社会主义资本运行的新环境，激活人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想象力，以此来改善文化生产力，最终达到让资本逻辑为全面发展的人服务的目的。

我们从文化自觉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可以看到，只有在物质实践活动达到一种精神生活“不得不发”的状态之后，才会有以文化精英为载体的文化自觉涌现。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文化精英体早已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作为文化大启蒙的大众化道路正在铺建，道路的不远处，即为文化自觉的“应是”景观——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三、文化自觉的“应是”景观：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国的又一次精神大呼吸，也是资本逻辑被压抑已久的大众文化自觉的大吐纳。从邓小平同志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到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说明我国正在从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意识凸显逐渐走向了对大众的文化启蒙的新境界。在此宏观战略的大背景之下，国内对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创造力等概念的研究和讨论将会交织成丰富的辩证图景，文化大繁荣应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对于其他文化概念而言，文化自觉则和文化源点的理论距离更近，文化自觉是其他文化范畴的意识前在性建构。在此境域之下，大众的文化自觉也是呼之欲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精英对大众的时代大启蒙，大众的文化自觉在此也是呼之欲出，文化精英的任务是对于大众化启蒙机制的完善和健全，大众的时代任务是对于

这种启蒙机制主动迎上，双向发力，共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强国和文化自觉有同构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异质性的一面。大致说来，文化自觉和文化强国具有内在理念的一致构造，彼此为镜像，又彼此成全，二者都是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做铺垫。同时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即文化自觉是路径，文化强国是目标；文化自觉是主观意识，文化强国是具有客观标准来衡量的主客统一体。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能成为文化自觉的“应是”景观，主要是受文化自觉的超越性、价值引导性和创造性所驱使。

第一，文化自觉的创造性。文化自觉不仅仅是对于传统和现在知识层面的数量积累，还是一种具有向未来喷薄的智能意识。其创造性体现为一种精神的不安分的状态，表征为对传统和当下文化现状的深刻反思基础之上建构起来新的文化实践维度，在文化自觉向未来创造的驱使之下，传统的历史表现为一种能动的动态文化系统，和现实文化进行交流、碰撞、新生。现在的任何一种创造活动都是关照未来的，放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文化自觉的创造活动是建设文化强国的精神动因，也可以作用于文化实践。文化自觉对于文化实践的影响，主要在于让主体的文化实践模式朝向更完善更合理的未来维度，文化自觉的创造属性给实践主体提供了生产力飞升的可能。主体在文化自觉创造性的驱使之下，其意志与情感、知识和艺术也开启了向未来创造的大门，这些主体性的要素从文化精英层面逐步渗透到大众层面，大众对于生产力的文化认知、对生产结构转型的主体动力，都将由此开启。并且，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人类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格外重视文化自觉的创造性，启发大众的文化创造力，唤起人们的文化能动性，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稳步迈进。

第二，文化自觉的价值引导性。文化自觉的价值引导性主要体现在，在传统和现在创造性的结合中，对传统文化进行真善美的过滤，对现实生活景观进行价值观层面的批判，对文化实践的主体进行价值引导，以此作为向未来展开的价值支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终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之境。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主体文化自觉价值属性的喷涌状态，是传统价值观中的活力因子和现代社会中实践主体价值自觉的融合体，是在完成了对传统价值观的批判和继承、对密布资本逻辑的大众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观空场的补场，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历史的精华也是时代的精华。这也正是文化自觉建构人类社会的未来价值观的价值基石。

第三，文化自觉的超越性。文化自觉的超越性主要表现为对现实和对传统的超越，而超越的途径则是通过现在和传统创新结合，以关照未来。超越不是弃之不用，而是历史辩证法的扬弃，是去粗取精的继承。所以，传统和现在稳定的结合点应是文化自觉超越性的支点。从我国当下文化实践的现状来看，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中仍彰显其动态积极作用的是：“和而不同的价值原则、忧患图强的民族气质、内圣外王的人格修养、忠恕诚信的交往原则、参赞化育的生态情怀”。^[14] 这些传统的文化观念并没有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而是以现时态的方式存在着，它们不是存在于过去，而是存在于现时之中，存在于现代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之中，存在于我们的实践状态和精神状态之中。”^[15] 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作为时代精英的共产党人所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承接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文化历史的传承，也是现在和过去创造性的结合体现，这正是我们面向文化自觉未来景观的起点。在文化自觉的超越本能驱使下，大众日常生活世界中隐形交织的资本逻辑、娱乐传媒形而下的单向度魅惑、文化霸权重压之下的沉沦态，以及面对有文化殖民气势的文化霸权的文化自卑情结、无视现实只在传统中栖息的文化自负情结都将被未来维度所扬弃。具有超越性特征的文化自觉，也赋予社会主义强国关于文化理想态的未来图景。在通向文化强国的道途中，主体通过将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对客观事物进行超越性的加工和重构，将人类求真、向善、至美的理想文化图景赋予客观事物。文化自觉的超越性也表现出其创造性和价值引导性。文化自觉的创造性对应的是文化实践，文化自觉的价值引导性对应的是精神维度，文化自觉的超越性对应的是文化理想图景。三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统一体。所以，文化自觉超越性的着力点，在于文化创造力提供的文化实践和文化自觉价值引导的真善美路

径上,放飞文化想象力,勾勒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图景,以此来激励和引导主体的实践活动。

由此可见,文化自觉不仅是主体对于自身文化时空坐标的静态映现,而且是一种具有创造性、超越性和价值引导性的历史动能。但是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实践路径,文化自觉只能沦为在主观世界里悬空的形而上学。针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观目标,文化自觉也只有通过实践的路径,才能表现为改变世界、创造世界的历史正途。所以我们要追问具有抽象性特征的文化自觉,如何转化为可被实践操作的正能量?即文化自觉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实践,才能通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文化自觉的历史源起的宏观脉络来看,我们当下的处境是主体性的充分觉醒,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也已经初成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框架也已建构起来。时下已经进入作为文化精英的共产党人对于大众文化自觉的大启蒙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何种大众化的渠道能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去,让人们的文化自觉升华到社会主义文化自觉,这应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有一点需要澄明的是,大众化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一种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作为成熟的体系,也能查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场景、了解他们的实践视野、明了他们的真实所需,按大众的公共诉求来刺激文化精英进行大众化的思考,所以大众化是文化精英和普通人们的双向互映态。结合我国当下的国情来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和削弱人们文化诉求的双向功能,这是资本内部的张力。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型是我们实现文化大启蒙的着力点之一,以实现资本对于物质和文化的双向满足,让资本关切的不仅仅是利益,也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所以,我们要完善资本运行的文化环境,打通文化通往资本市场的途径。我们不光要梳理出价值规律的波浪线,还要利用这条波浪线完成对资本的文而化之,即将主体的文化意识渗入资本市场,让文化成为资本获取利益的有效途径,将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注入商品,实现消费是人们出于自身高雅审美的主动选择,在整个商品流通环节中实现资本的道德化和艺术化,让文化生产、文化商品流通、文化消费成为价值规律应有的动态智能。在社会主义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驱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之后,流通的是充满人文情怀和实践智慧的文化资本,人们能在每件商品中关切到作为主体的“我”,不仅仅是资本流通的环节,也是文化作用力的受力对象。这就是文化通过资本完成对人民的大众化启蒙,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人们文化自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人们文化自觉一旦形成,也会对资本运行的环境起到监督作用,这时候,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作为消费符号的对人的单向度化的“裸奔”资本。资本市场的丛林法则最终演化为商品中文化内涵的竞争,商家之间的博弈也会随之演化为文化的博弈。所以,为了实现资本丰富灵肉的双向化功能,启蒙出人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的文化自觉,我们就要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创意产业,发挥文化想象力,实现文化创造力,迈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 [2] 王俊义:《一位世纪学人的文化情怀——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解读》,《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11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5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页。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26页。
- [8][10][15]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5、387、383页。
- [9]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 [11][12][13] 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3、8页。
- [14] 孙利:《文化自觉与传统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

责任编辑:何蔚荣